

如何欣赏一幅中国画

■本报记者 张文静

对于中国画,你了解多少?或许你从历史课本里见过《女史箴图》,但这幅“古代女子图鉴”是如何流落到大英博物馆的?你一定听说过《清明上河图》,可为什么有人认为它描绘了盛世繁华,有人却看出了其中暗藏的社会危机?相比之下,唐代韩滉的《五牛图》对很多人来说就稍显陌生了。实际上,它是学界公认的传世卷轴画中最早的一幅,堪称国宝。而画家为何不画四头牛、六头牛,偏偏画了五头牛?在新书《了不起的中国画:清宫旧藏追踪录》(以下简称《了不起的中国画》)中,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余辉对这些问题一一给出了自己的解答。在揭秘古画谜团的同时,他更希望通过这本书告诉读者如何读懂、欣赏中国画。

《了不起的中国画:清宫旧藏追踪录》,余辉著,上海书画出版社
2021年8月出版,定价:108元



《清明上河图》里竟然埋了“雷”

《了不起的中国画》脱胎于余辉2020年夏天播出的线上课程《十大古画谜案——故宫旧藏背后的文化密码》。在课程与书中,余辉选取了自己研究生涯中“追踪”的十个古画案例,逐一解开作者的创作动机和目的、绘画内容、收藏过程等谜团。

所谓古画之谜,余辉告诉《中国科学报》,并不是指画家在画中做了个局,暗藏了一些秘密。而是漫长的时间冲淡了我们对当时历史背景的认识,造成了理解的困难。因而,越是蕴含着丰富历史文化信息的画作,谜团就越多。而解开谜团的方法,就是尽可能“穿越”回画家作画的现场,见他所见,想他所想。

从1990年到故宫博物院做书画研究起,余辉的工作就是通过考察画中细节、查阅历史文献等方式,无数次“穿越”回各个画家的不同时代,去理解其画中展现的种种信息。

比如他对《清明上河图》的研究。很多人认为,《清明上河图》描绘的是宋代高度发达的商业社会,展现了盛世繁华。但余辉十几年年来结合大量历史文献与画作相互对比、印证,认为这幅画中隐藏着诸多令人心惊肉跳的细节。

《东京梦华录》中记载,京师于高处砖砌望火楼,开封有一百二十坊,每一坊都有一个望火楼。但整个《清明上河图》中街道绵延十里,却没有一座望火楼。唯一一座砖砌高台,已经改成了凉亭供人休息,楼下的营房也改成了饭铺。再往前,一个官衙模样的建筑,门口横七竖八躺着几个士兵。他们身边有两个文件箱,却躺在这里睡大觉、发

愣。在余辉看来,这些画面都展现出北宋冗官、冗兵、冗费的现状。

画中这样的细节还有很多,比如汴河上停泊着许多运粮漕船,但都是没有官员和士兵看守的私船。然而事实上,宋太祖早就立下规矩,朝廷必须掌控京畿要地的粮食,私粮不得入内。只不过,宋徽宗显然没有从这幅画中

中获得教益,他只是肯定了画家的技艺,写上题签,盖上双龙印就将《清明上河图》转赠给外戚向氏了。

在余辉看来,这些画中埋的“雷”都呈现出北宋当时已出现的诸多社会弊病,而这些社会问题与宋史研究者考证的宋末大臣屡上奏的主题是一致的。作为宫廷画家的张择端作此长卷,正是意在向宋徽宗进谏。

这种画法是符合宋代的社会背景的。余辉介绍说,北宋采取文官治国的国策,鼓励文人进谏,立下了“不得杀言事者”的戒律,关注社会现实和朝廷政治是宋代画家较为普遍的创作倾向。只不过,宋徽宗显然没有从这幅画中获得教益,他只是肯定了画家的技艺,写上题签,盖上双龙印就将《清明上河图》转赠给外戚向氏了。

五头牛的数字谜题

对《清明上河图》的这种解读,与我们通常的认知似乎有所不同。但余辉说,这并不是他自己脑洞大开的首创,而是已经持续了七八百

年的观点,只不过自己的研究印证了它。

历史上,关于《清明上河图》的创作意图,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直在交织斗争,如明代大太监冯保看了该图后,顿感“心思爽然”,而元代李祁在跋文中则说该图“犹有忧勤惕厉之意”,已经佚失的明代邵宝跋文也强调,该图的政治作用是“触于目而警于心”,等等。

对同一幅古画的解读,有些业已形成相对统一的意见,有些至今仍争论不休,这种情况在美术史上并不鲜见。比如余辉在书中介绍的《五牛图》,这幅画上并没有画家的名款,但学界已有公认,此画出自唐代宰相画家韩滉之手。但对于韩滉画五头牛的用意,历史上却一直争议不断。

从宋末元初的赵孟頫到清代的乾隆皇帝,再到今人,都有不同的见解。有人认为,画中的五头牛是比喻韩滉一家几个兄弟,只有第五头牛戴着笼头,象征兄弟中只有韩滉自己效命朝廷,另外四个兄弟自由自在。但余辉说,据考证,其实韩滉兄弟至少有七个,且各个在朝为官,这种说法显然不符合实际。在他看来,解答这个疑问必须要深入了解韩滉的个人经历和当时的历史背景。

韩滉在安史之乱后一步步登上政治舞台,在崇道崇佛的风气下,他内心怀揣着儒家治国的理念,支撑着这座行将倒塌的封建大厦。传统文化中,“五”与农业有关,如五谷、五果、五畜;从儒家思想上看,“五”与道德相关,五德即为温良恭俭让。因此余辉认为,这幅画正是韩滉在婉转地表达自己重农重耕重社稷的儒家治国思想。

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面对一幅古画也是如此。鉴赏者的历史积累不同、欣

赏角度不同,甚至个人经历不同,都会产生不同的意见,而这些想法让一幅幅古画有了更多的可能性,也让我们一步步接近真相。

揭秘只是艺术史的一部分

在余辉看来,当我们对画家的创作意图有更多了解时,对画作的认识也会更趋于本质。如明宣宗朱瞻基所作的《瓜鼠图》,如果只看到了画中的西瓜和老鼠,那是处于“看图说话”的层面;如果知道两者都有“多子”的意象,则进入到“看图讲知识”的层面;若将这幅画与朱瞻基作画的具体时间和事件联系起来,就进入到“看图揭秘”的层面了,对画作的欣赏也就更加余味悠长。

《瓜鼠图》上有朱瞻基亲自题写的年款——“宣德丁未(1427)御笔戏写”。余辉介绍说,1427年是朱瞻基登基的第三年,近30岁的他久久无子,这意味着皇位继承权可能旁落。而就在这一年,他的长子朱祁镇出生。除了这幅《瓜鼠图》,朱瞻基还接连画了多幅类似题材的画作,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这样的解读是有历史背景的,也是有温度的。单纯就画说画会流于表面的泛泛而谈,而通过探索古代画家作画的背景,汲取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则会把古画揭秘引向深入,与其他相关的知识相链接,发现我们以往不知道的历史事实。”余辉说。

但他同时也强调,“千万不要认为一定要在古画中看出官斗,看出政治,揭出其中的弥天大案,否则就不深刻,就没有看头,绝不是这样的”。

“揭秘只是艺术史研究的一个部分,如对《清明上河图》和一些‘谍画’来说,揭秘是核心问题,但对许多古画来说并不是。有些绘画主题非常直白,有些作者有明确阐释,这些画作只需要一般的生活常识就可欣赏。”余辉举例说,如元代任仁发的《二马图》,画了两匹马,一匹肥马比喻宦官,另一匹瘦马比喻廉臣,不用考证,跋文里就这样写的。还有很多绘画传达的是画家的个人情感、显现出新的绘画构思和技巧,如北宋崔白《寒雀图》,一改此前绘画中动物彼此孤立的状态,充分展现了九只麻雀密切的呼应关系,是一种革命性的突破。

“古画中的政治含义和一些隐喻,有就是有,没有就不要生拉硬拽、牵强附会,那样只能适得其反,走到学术研究和艺术赏析的反面。”余辉说。

对于普通读者来说,要想从古画欣赏中获得更多的艺术享受,余辉建议多去逛逛博物馆,多了解一些艺术史知识。而对于自己这样的研究者,余辉说:“将学术研究通俗化并与社会公众一起分享,是我三十年来学术生涯的终极目标。学术成果属于精神财富,应该成为社会公器,为大众所有,听大众点评。”

借诺奖东风,说移民文学

■林颐

诺贝尔文学奖为什么颁给阿卜杜勒—拉扎克·古尔纳这位“冷门”作家?

颁奖词说:“以表彰他对殖民主义影响以及文化和大陆鸿沟中难民命运的毫不妥协和有同情心的洞察。”选择他,体现了诺贝尔文学奖对于移民文学的关注。

古尔纳目前是居住在英国用英语写作的作家,还是英国肯特大学的教授,换句话说,古尔纳是一位移民作家。2001年获奖的V.S.奈保尔、2017年获奖的石黑一雄,都是移民作家。

评论家张峰写的文章,叫《游走在中心和边缘之间:阿卜杜勒—拉扎克·古尔纳的流散》。这个文章的标题实际上点明了移民作家身上共同的特点——那种游走的、不安的流散感。

如果往前追溯,1987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约瑟夫·布罗茨基对此感受尤其鲜明。

布罗茨基有篇名文,叫《我们称之为“流亡”的状态,或曰浮起的橡皮》。布罗茨基说,移位和错位是这个世纪的一个常见现象。布罗茨基描述了自己所代表的流亡作家的处境,他所抵达的民主向他提供了人身安全,却使他在社会上变得无足轻重。流亡的现实包含着流亡作家为恢复其意义、其领导角色以及权威所进行的不懈斗争和策划。

流亡的境况本身,就是把知识分子置入了一种与文化的矛盾的关系之中。萨义德曾经如此表述对流亡、知识分子与文化的相互

关系的看法的矛盾性:那种把知识分子设置为外人的模式的最好例子就是流亡的境况,就是永远不完全适应、永远觉得外在于土著的困顿的、熟悉的世界的那种状态……

这种状态把移民作家悬置在那里,使得他们不可能回到某个先前的,也许更加稳定的在家境况。为了获得这种在家境况,我们知道,纳博科夫几乎完全消除了早年的俄国痕迹而变成一位相当美国味儿的作家。而另外一些作家,比如米兰·昆德拉,定居法国,坚持捷克语写作,同时拒绝返回自己的国家。

这些更老资格的移民作家,他们的处境要用“流亡”来形容。到了奈保尔、石黑一雄、古尔纳等人,“流亡”变成了“流散”,词语的情感维度的下降,意味着这批移民作家的处境有所改善,但他们依然游走在中心和边缘之间,只是程度与感受有所减轻。

瑞典文学院常务秘书、本届诺贝尔文学奖评选委员会主席安德斯·奥尔森说:“在古尔纳的文学世界中,一切都在变化——记忆、名字、身份。这可能是因为他的创作在任何确定的意义上都无法完成,在他所有的作品中都呈现出一种由智者的热情驱动的永无止境的探索。”

记忆、名字、身份,几乎是所有移民作家不断书写的主题。昆德拉形容,移民作家就像杂技演员一般,走在两种语言之间拉紧的绳索上,对他而言,重要的是身份。什么时候他最是他自己?当他用自己最初所讲的语言,还是用他的东道主语言进行自我表达时?

原籍保加利亚的法国作家茱莉亚·克里斯蒂娃表述了徘徊在两种语言之间的撕裂感,这种被克里斯蒂娃描绘为痛苦和异化的感觉,用一个文化概念来解释,就是“他者”。这个概念涉及社会身份塑造和主体地位的关联。这个概念可以回溯到黑格尔那里。黑格尔认为,如果没有他者的承认,人类的意识就不可能认识到自身。就此来说,“流散”就是全人类普遍具有的情感特征,我们每个人都去寻找自己的故乡家园。

全球化的今天,流动在加速,移民文学的本质,植根于全球资本主义时代的现代性。而现代性问题是一个更大的话题,我们就此打住吧。

古尔纳陌生的风景

近日,一本名为《非洲短篇小说选集》的书频频被读者和书评人提及,原因是2021年诺贝尔文学奖。10月7日,出生于坦桑尼亚的英国非裔小说家阿卜杜勒—拉扎克·古尔纳获得2021年诺贝尔文学奖。这位“冷门”作家的作品在国内并无引进,仅有两篇短篇小说收录在《非洲短篇小说选集》中,该书2014年由译林出版社出版。

古尔纳是谁?不仅国内鲜有人知道他的名字,即使在国外,古尔纳名气也不算特别大。在诺贝尔奖的官方推特发起的投票中,有93%来自世界各地的读者表示从未读过他的作品。

古尔纳1948年出生于桑给巴尔,20世纪60年代末作为难民来到英国。1982年,古尔纳获得英国肯特大学博士学位。

1985年,古尔纳开始在肯特大学英语系任教(现已退休),主要研究殖民主义和后殖民写作,特别关注非洲、加勒比海地区和印度。在此期间,古尔纳发表过不少关于当代后殖民作家及其作品的论文,研究奈保尔、拉什迪、索因卡等作家,主编过两卷《Essays on African Writing》(《非洲文集》),还曾担任英国文学刊物《Wasafiri》(《旅行者》)副主编。

古尔纳于1987年开始创作,目前写有十部长篇小说和若干短篇小说。尽管斯瓦希里语是他的母语,但英语是他的主要写作语言,难民则是贯穿他所有作品的重要主题。他最著名的作品是1994年的小说《Paradise》(《天堂》)。这部背景设定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东非殖民地的小说入围了布克小说奖。2020年古尔纳最新出版的小说《Afterlives》(《来世》)是对《天堂》的延续,继续讲述了从20世纪初开始的非洲东部的历史。

据媒体统计,诺贝尔文学奖在其120年的历史中主要授予西方人。自1901年诺贝尔奖首次颁发以来诞生的118位文学奖得主中,有95人,也就是说超过80%是欧洲人或北美人。10月7日宣布古尔纳获奖这一消息之前,诺贝尔奖观察人士就曾表示,瑞典文学院可能会把奖项颁给一位来自亚洲或非洲的作家,因为瑞典文学院曾承诺将使这个奖项更加多元化。因此诺贝尔文学奖的去欧洲中心主义是古尔纳获奖的重要背景。



佐·马雷切拉、纽斯塔特国际文学奖得主阿西娅·杰巴尔……古尔纳被收录的作品有两篇,一篇叫做《博西》,另一篇叫做《囚笼》。

《非洲短篇小说选集》描绘出在非洲这片有着众多组成元素和复杂历史的土地上,人们以怎样的方式生活,又如何看待自身的存在和将来。

正如《非洲短篇小说选集》译者查明建所说,读这本书,“既可了解非洲人从殖民时代到后殖民时代的生活变化,又可看到非洲小说创作的嬗变及其现代性发展”。(李西米)



阿卜杜勒—拉扎克·古尔纳

(上接第5版)

时隔十年,在北京我的工作室,同样是面对面塑他。翁帆和我夫人在场,杨先生泰然自若,也许他从翁帆的眼神中得到肯定。两小时后,面对塑就的胸像,杨先生对待已熟识的自己,没有提任何意见,也没有询问在场的任何人。他已超然。正如他所说,“塑像是一个三度空间的东西,是静止的,可是一个雕塑家要把它制作出来,成为一个超越时空的,而且有一种特别的精神,可以想象是非常困难……当然我知道这雕像还有一个特点,再过几十年,大家觉得这个就是杨振宁应该的样子”。

以客观自然规律和历史逻辑看待自己的人生、评价雕塑的价值,在艺术与现实之间、在塑者与被塑者之间,杨先生以豁达的态度、以诗化的哲学,在宏阔的多向维度,品味着艺术与艺术作品、人生与人生境界……

自1997年至今,我先后为杨先生塑过头像、胸像、全身像。有青铜铸就的,也有汉白玉雕琢的,分别立于南京大学、南京博物院、清华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台湾清华大学等。塑像展现出杨先生那饱满的天庭、富有数理逻辑的方正脸型、一丝不苟的发型、儒雅内敛的嘴角,永远向世界发出疑问又获得肯定的敏锐而深情、仁厚的双眼……塑像立于图书馆的大厅,或伫立于大学绿色草坪,或在博物馆展厅,在灯光或自然光的照耀下,单纯、清晰,雕塑的线条和块面、受光面与投影,构成利落大方、客观本然的艺术形体。随着光线的移动,产生无数的韵律,它还原了艺术创作过程中手指与刀痕的节奏变化,时浅时深,时捷时缓,时曲时直,十指连心,大拇指顺着形体结构的滑动,推压所形成的轨迹。在微妙的神情中,展示了科学家认识世界的无限可能,仿佛宇宙万象也在光的晃耀中进入科学家探索真理的行程。其实,这颗心灵在融通有形与无形、连接客观与主观世界中,表现为“性灵”,正如杨振宁先生所喜欢的高适(704~765)的诗句所云,“性灵出万象”。它包含了儒家关注现实的人世之道,也包含了道家超然出世的“逸”境,这是中华人文精神所在。在杨先生的气象里,还辉映着科学理性之光。这颗灵透接中国圣贤思想智慧。杨先生在评述我创作的孔子像时这样写道:两千多年来,中华民族遵循孔子的教导,创建了世界上最悠久持续、最多人口、最有尊严生命力的和谐文化传统,所以中国人尊称孔子为至圣先师。

可见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中华文明之魂渗入其脉。因此,拳拳赤子心、殷殷家国情在他的精神深处时时流露。在他的塑像落成于清华大学时,他说:“我出生在中国,生长在旧中国,现在定居在清华大学,我对新中国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从旧中国到新中国是一个史无前例的、不能想象的变迁,而且这个变化还在继续进行着。我为自己能够在晚年参与这样一个重大的变迁而感到非常幸运。当然,这里面也包含了很多朋友的促成,这个雕像放在这里也就是许多促成中的一个……”

由此可知,雕像在杨先生心中的分量。因为,从雕像可以看到立体的自己,可以看到他人的评价,不仅可以“吾日三省吾身”,还可让历史、未来“三省”其身。记得2001年,杨先生看我为他所作的泥塑像时,曾意味深长地对熊秉明先生说:“我想,如果把每个人看自己塑像之前的心理状态作一番记载,那将是很意义的。”

其实,塑像是主客观相结合的产物。真的塑像是自我塑造。正如我曾给杨先生的信件中所写,“在人类发展的进程中,信用自己的人品、学识自塑了一尊雕像……因此我想底座上还是只写‘杨振宁’三个字,不要任何后缀(头衔),且最好你自己来写”。

回顾与杨振宁先生的交往,1998年他第一次到我工作室便题写“艺术与科学的灵魂同是创新”;2002年为熊秉明先生的《孺子牛》题写“秉明塑造出二十世纪几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自我认识”;在谈到他一生的成就时,他说:“我一生中最重要的贡献是帮助改变了中国人自己觉得不如人的心理作用”。这些近乎于公理、定律的思想精粹折射了他的学养、道德、修为。令我十分崇敬的是他将珍藏的熊秉明三件代表作捐赠给中国美术馆,安家为国宝。近二十年来,我时常去清华园杨先生家中,聆听其言。所感动者,近百岁的大哲思路清晰、语言流畅,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充满信心与期待。

写到这里,敬仰之情,由内而外。我们将真性比喻成天空,云之上,一片澄明。杨先生,一个世纪走过来了,这是无数次吐故纳新的生命历程。他在自己的汉白玉像前仁立、凝神,那微笑可算是这世界上返璞归真的最纯真、最灿烂的笑!(作者系中国美术馆馆长)

我为杨振宁先生塑像